

雙層贊助、內部發行與錯位詩學—— 《麥田裡的守望者》在 1960 年代大陸

張欣

一九六〇年代，為滿足中蘇論戰間反資批修的需要，《麥田裡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塞林格，1951／1963）在政府部門與出版單位的雙層贊助下被首度引入大陸並受到嚴格管控，其內部發行的漢語譯本也就此構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本土主流詩學體系的負面參照。但在小說譯介的政治考量和詩學衝突背後，還潛藏有更加複雜的互動機制。從贊助角度看，正因為作家出版社取得了政府贊助人下放的文本選擇權，社內的編輯兼譯者施咸榮才能訴諸體制授權，合法地挑中了《麥田裡的守望者》作為譯介對象，不過譯者的擇取標準未必就呼應著反資批修的政治號召，而可能是源自對小說藝術價值的肯定與恢復美國真容的企望。在詩學意義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從抒情到象徵的話語動態交替歷程，召喚出圍繞該翻譯小說的跨境批判，這些批判又轉而透過對集體象徵的鞏固介入了持續流變的本土詩學，並最終助力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遵循著某種克服與超越的現代性脈絡不斷地推展。本文透過對有關史料的抽絲剝繭，力圖廓清小說在 1960 年代大陸的贊助機制和錯位詩學，進而呈現出小說譯本、意識形態及主流詩學的相與交雜，由此為內部發行的文化現象鉤沉起曾被忽略的個案細節，同時就翻譯文學的歷史書寫展開了一定程度的理論反思。

關鍵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內部發行、《麥田裡的守望者》、雙層贊助

收件：2022 年 12 月 5 日

修改：2023 年 3 月 6 日

接受：2023 年 6 月 17 日

張欣，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翻譯系博士候選人，E-mail: zhangxin19960204@163.com。

拙文承蒙匿名專家費心評閱，不勝感激。筆者寫作期間，王宏志教授悉心指導，查明建教授、崔峰博士亦提供了寶貴的建議，謹致謝忱。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n the Mainland During the 1960s: Double-Deck Patrons,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Discordant Poetics**

Xin Zhang

To facilitate criticism of Western capitalism and Soviet revisionism during the 1960s Sino-Soviet dispute, *The Catcher in the Rye* w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ternally in the Mainland under the double-deck patronage of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The novel's strictly regimented translation constituted a text subversive to socialist realism, the highly politicized poetic ordinance that governed the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at the time. Behind the political motive for patronizing this translation and the ensuing poetic conflict, however, lie much more complex dynamics. Which foreign literature to translate was largely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by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editor and translator Xianrong Shi was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institutional power and select *The Catcher in the Rye* for translation. Shi's personal motives to translate it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 widespread antirevisionist and anticapitalist sentiments in the 1960s; rather, they had much to do with his appreciation of the novel's artistic value and hopes for an undemonized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placing the novel's transcultural journey within the discursive transition of socialist realism from romantic to symbolic, moreover, it is seen that socialist realism's collective symbolism called forth the Chinese criticism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n translation, reinforcing this symbolism and ultimately promoting the incessant evolution of socialist realism along certain lines of modernity.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sourc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the novel's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atronized by a double-deck mechanism and interwoven into socialist realism, thus revealing the dynamics between literary translation, political ideology, and dominant poetics in the Mainland during the 1960s. The authors contribute to research on internally circulated renditions as a transcultural phenomenon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socialist realism, internal circulatio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double-deck patrons

Received: December 5, 2022

Revised: March 6, 2023

Accepted: June 17, 2023

壹、引言

自 1951 年付梓以來，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的《麥田裡的守望者》（Salinger, 1951）絕對算是美國文學出版史與譯介史上最受讀者歡迎的長篇小說之一，早在 1990 年代，該小說的全球總銷量就突破了 6,500 萬冊，並被翻譯成為德、西、漢、日等 30 種語言（Blackstock, 1992, p. 1803; Whitefield, 1997, p. 568）。本文在這裡所關注的便是《麥田裡的守望者》首次被譯介到大陸的情形，¹ 這場特殊的跨境歷程讓我們有機會去管窺翻譯、政治和詩學間錯綜複雜的纏繞關係。

一九六〇年代，全球冷戰下意識形態的嚴陣對峙統轄著大陸的社會經濟生活與思想文化動態，為滿足中蘇論戰²間反資反修³的需求，源自於蘇聯和西方的部分文藝創作及政治學術專著被引入新中國並受到了管控，僅供精英階層用來批判研讀——這當中就包括《麥田裡的守望者》。小說透過青少年霍爾頓（Holden Caulfield）的自敘視角，主要寫他遭學校開除後孑然浪跡於紐約街頭的三天兩夜，重點刻畫其蔑倫悖理的言行舉止和焦躁難安的精神狀態，由此表徵出工業文明下個體同自我、他人、社會的疏離。但彼時納入體制的本土主流詩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變種——卻透過精心打造英雄楷模並反覆渲染革命鬥爭，來鞏固無產階級文藝話語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言，《麥田裡的守望者》中離經叛道的內心獨白、消解集體的個人敘事、顛覆正統的小說母題等因素自然顯得古怪而又危險，由此為文學／政治批判提供了有效話語資源。所以過往相關研究通常認為，該部翻譯小說既是政治產物又是詩學異端（方長安，2009，頁 61—68；張欣，

¹ 為求行文方便，全篇的「大陸」均指涉中國大陸。

² 「中蘇論戰」（也作「兩黨論戰」）是 1960 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在兩國關係迅速惡化時圍繞意識形態衝突所展開的一系列大辯論，涉及內容相當廣泛，包括史達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問題、戰爭與和平、蘇聯修正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等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 1963 年 9 月 6 日至 1964 年 7 月 14 日在《人民日報》等機關刊物上連續發表九篇社論批駁蘇共 1963 年 7 月 14 日致中共的公開信（史稱「九評蘇共」），標誌著論戰的高潮。論戰持續到 1965 年底，兩黨關係已完全破裂。

³ 「反資反修」（也作「反資批修」）即反對西方資本主義、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這是 1960 年代的冷戰語境下大陸在國際關係上採取的基本路線，構成了彼時的官方意識形態。

2020；楊露，2015；Zhang, 2021），這個共識也構成本文論述的基礎。儘管如此，我們卻不願籠統地簡化或靜態地處理小說譯介中的政治操縱以及詩學衝突，而想著力把握其間那些相與交雜的具體面向，譬如：在反資批修的政治號召下，選擇譯介《麥田裡的守望者》存有何種「非政治」甚或「去政治」考量？⁴此一選擇又怎樣表徵出贊助機構的體制高壓下，專業人士的主觀能動性？透過小說譯作同本土主流詩學錯位的表象，我們該如何去理解這衝突背後的深層邏輯？

在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概念框架下，本文透過對有關史料的抽絲剝繭，力圖廓清小說在 1960 年代大陸的翻譯贊助模式和詩學錯位邏輯，進而呈現出贊助機構與意識形態、小說譯本跟主流詩學的交相互動，由此為內部發行的文化現象鉤沉起曾被忽略的個案細節，同時就翻譯文學的歷史書寫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論反思。

貳、體制的縫隙：雙層贊助下的內部發行

新中國「十七年」⁵期間，政治意識形態湮沒了文藝審美建構，深刻地規訓著整個翻譯文學系統，這一點在當時有關翻譯的官方話語中已經表述得十分明確。無論是 1950 年編譯局所發出的要使全國翻譯工作「逐漸走上有組織有計畫的道路」（沈志遠，1950，頁 2—3）的號召，抑或是 1966 年《世界文學》雜誌對外國文學翻譯旨在「揭露所謂『自由世界』腐朽的文化生活和醜惡的精神面貌」（馮至，1966，頁 193）的定位，都表明翻譯文學曾經被納入了體制化的軌道，並隨時準備要服務於意識形態鬥爭。作為翻譯文學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文學譯介的走向與訴求自然也打上了政治規訓的深刻烙印。除了如吐溫（Mark Twain）、倫敦（Jack London）這樣的經典作家

⁴ 此處「非政治」或者「去政治」是個較狹義的概念，指涉一切偏離了 60 年代初期之官方意識形態的思想政治傾向。當時所謂的「官方意識形態」主要包括了反西方資本主義、反蘇聯修正主義、反帝國殖民主義等革命理念。

⁵ 新中國「十七年」指建國後至「文革」前的這段歷史時期，即 1949 至 1966 年間。

因其反壓迫的「人民性」而獲譯介之外，便只有一批徘徊在源語文學系統邊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取得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認可，而被允許進入當代文學系統，⁶但 20 世紀美國文學史上那些享譽盛名的現代主義文學，卻大都被排斥在譯介視野之外。⁷有趣的是，《麥田裡的守望者》作為一部文學形式與思想內容均脫離了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美國當代長篇小說，竟在全球冷戰和中蘇論戰的歷史條件下，意外獲得了譯介合法性，成為彼時翻譯文學系統中內部發行的反面教材，並與其他受到管制的翻譯文學一起被後世統稱為「黃皮書」。⁸

蔣華傑與劉陽（2013）把「內部發行」界定為「在一定範圍內可控制地出版和流通內容具有潛在危害性但又有參考價值的出版物」（頁 35），其中黃皮書印數非常少，在 1960 年代初「嚴格控制在 500 冊至 2,000 冊，內容敏感的黃皮書印數極少」（頁 38）。更重要的問題是，誰在決定哪些書目內容有潛在危害卻又有參考價值？又由誰來參與管制這批書籍的流通範圍與發行對象？Lefevere（1992）在他經典的《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控制》（*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書中，為我

⁶ 如薩克斯頓（A. Saxton）、馬爾茲（Albert Maltz）、奧達茨（Clifford Odets）、法斯特（Howard Fast）、勃朗（L. L. Brown）、鮑諾斯基（Philip Bonosky）、希爾德烈斯（Richard Hildreth）、雷特（Richard Wright）、季洛姆（V. J. Jerome）、威爾士（W. R. Wells）等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代表被大量地譯介。

⁷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數帶有現代主義特徵的西方作家作品在 1960 年代前後獲得公開譯介，如「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和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方長安，2009，頁 45—56）。與此對照，上條註釋中提到的進步作家法斯特後來脫離了美國共產黨，不僅導致法氏本人被大陸官方斥為叛徒（曹禹，1958），而且還使黃雨石重譯好的《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最終無法付梓（蘇福忠，2000，頁 103）。這便提醒我們，整個「十七年」期間的政治規訓並非從始至終都是鐵板一塊，在某些語境下，意識形態話語依然為其他類型話語（譬如文學審美話語）留出了有限的自我表述空間。唯有牢牢把握彼時大陸社會文化空間的多質性及政治意識形態的動態性，才能真正理解《麥田裡的守望者》首部中譯本誕生的具體語境。

⁸ 「黃皮書」概指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間譯自蘇聯和歐美、並受到嚴格管制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文藝圖書，此外，還有一批外國政治社科書籍同樣當作反面教材獲得譯介，被稱為「灰皮書」。皮書發行計畫的前身是 1954 年在出版總署統籌下逐漸形成規模的內部發行網絡，後於 1960 年代正式參與反修，這也迎來了皮書出版的首個高峰（蔣華傑、劉陽，2013，頁 36—39）。因 1966 年爆發的「文革」而中斷了五年後，內部發行計畫又於 1971 年在周恩來指示下得以重新啟動，一直持續到 1980 年代（張福生，2006，版 98）。我們所關注的 1960 年代階段曾祕密地譯介了《局外人》（*L'Étranger*，1961 年）、《在路上》（*On the Road*，1962 年）、《麥田裡的守望者》（1963 年）、《帶星星的火車票》（*Звёздный билет*，1963 年）等一批黃皮書，主要的譯者有曹蘇玲、程代熙、馮南江、黃雨石、秦順新、施成榮、孫廣英、謝素台等。值得注意的是，黃皮書與灰皮書雖然裝幀設計非常簡樸，卻未必都以黃皮或灰皮作為封面，有時也見白皮、綠皮和紅皮，我們研究的《麥田裡的守望者》首部中譯本就以白皮作封。

們指出了文學系統之上懸置著的那個贊助人系統。Lefevere (1992) 發現，不同於從內部對文學系統進行操縱的專業人士，個體化或群體化的贊助人往往在文學系統外運作，他們通常以意識形態為旨歸來推動或阻礙文學的創作、閱讀和改寫 (pp. 14-15)。據此，王友貴 (2015) 進一步提出，伴隨著大陸出版行業在 1956 年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贊助人系統從建國前不同贊助人並存的多元格局，演化成為一種「雙層贊助結構」——底層的出版社贊助人附置於上層由政府贊助人，⁹ 前者始終受到後者的指導、支配與控制 (頁 59)。對於我們的課題而言，這一觀察基本準確。表面上看，是作家出版社直接地贊助了《麥田裡的守望者》的翻譯和出版，但作為中央國營出版社即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在意識形態上緊緊地追隨著官方意識形態，在經濟資助上並不能脫離政府有關部門，在社會地位上也無法獨力將受贊助的原創者或改寫者推往經典之列。首先，國有化出版社對意識形態的緊密追隨部分地體現在翻譯出版選目上，政府有關部門常常以文件形式自上而下地發出指示，劃定能合法譯介的作品範疇——即便出版社在譯介哪本書、聘請哪些人、時間怎麼排、宣傳如何作等細節性事務上具有決策權，但所有的選擇與行動都很難超越政策框架。¹⁰ 此外，國有化出版社並不按商業機構模式來運作，而是按事業單位模式來運作，這便意味著作家出版社盈虧不自負且靠政府補貼——就算出版社能決定作者和譯者的具體稿酬等級，但整個稿酬等級標準乃至於是否取消稿酬，都由政府部門拍板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1993，頁 509—511)。¹¹ 至此我們發現，Lefevere (1992) 所總結的三種贊助成分——意識形態、經濟資助和社會地位 (p. 16)——幾乎不受作家出版社自由支配，而更多地被把控在政府贊助人手中，這樣看來，前者只是「初級的、

⁹ 在王友貴 (2015) 的界定中，「政府贊助人」依次涵蓋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文化部和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頁 8)。

¹⁰ 縱觀 1960 年代的大陸出版史料，不難發現官方通常自上而下地劃定了選材的範圍，大量題名為《……通知》、《……決定》、《……辦法》的政策文件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辦公室，1982)。

¹¹ 當然，著譯者及其作品的經典化也無法僅靠出版社推動，權威媒體所發表的評論、官方組織所授予的表彰等因素構成了提升文藝工作者地位的關鍵。

一線的、顯在的贊助人」，後者才是「高級的、指導的、隱形的贊助方」（王友貴，2015，頁 59）。

一項更直接的證據是 1962 年 4 月中共中央（1997）批轉的〈文化部黨組和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黨組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又稱〈文藝八條〉），這份官方文件規定：

對於西方資產階級的反動文學藝術流派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潮，要注意了解和研究，並且有力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應該有計畫地向專業文學藝術工作者介紹這方面的作品，讓他們經常看看這方面的電影和繪畫等等，作為教育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反面材料。（頁 373）

此外，1963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原則上明確而嚴格地規定了這些材料的發行範圍和辦法」，「其發行對象由中宣部直接審批和管理」（蔣華傑、劉陽，2013，頁 38）。¹² 一切似乎都在表明，《麥田裡的守望者》等黃皮書的譯介、出版與流通本質上是一項嚴肅、機密的政治任務，握有終決權的政府贊助人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來把控整個內部發行計畫的定位、方向和走勢，而作家出版社最好被視為完成任務的工具機構——這便是我們基於相關政策文件並按「雙層贊助」說所能推導出的結論。

儘管承認這一觀察基本準確，但我們有理由認為，它太強調政府贊助人對作家出版社的規訓與控制，卻忽視了後者自身雖壓縮至極可依然存在的操縱空間——此一空間主要源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兼譯者施咸榮，¹³ 他曾向出版人李景端透露了自己在選譯《麥田裡的守望者》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李景端（2006）回憶道：

¹² 詳見中共中央（2009）。當時至少有兩種購書的正規渠道：一是出版社先按花名冊聯繫合資格的政府官員及知識分子，再透過郵寄來完成交易（楊露，2015，頁 159）；二是基層新華書店的內部發行門店直接賣書給那些有介紹信或購書證的顧客，並將銷售紀錄入檔備案（蔣華傑、劉陽，2013，頁 37）。顯然，上述各種憑證——花名冊、介紹信與購書證——都要經主管部門審批後才會生效，這便意味著政府贊助人大力管控了內部圖書的流通範圍和發行對象，儘管遠非滴水不漏。

¹³ 施咸榮，浙江省鄞縣人，資深編輯、著名學者和翻譯專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美國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副所長，中華美國學會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翻譯家協會理事，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1953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專業，畢業後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負責英美文學的審定和編輯等工作，直至 1981 年被調往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擔任社會文化室主任。1985 年被評為美國所研究員。1990 年起擔任副所長及《美國研究》副主編。

1960年代初期，他（施咸榮）參與了供內部發行的西方當代作品「黃皮書」的翻譯工作。那時大家對西方文壇所知極少，譯什麼書，主要由譯者自己選。他平時很注意學習，經常上北京圖書館借書看書，對英美當代社會和文化情況「還算了解一些」。（頁13—14）

另外，根據施亮（2006）所言，是他父親施咸榮與其同事黃雨石共同「主持編輯」了《麥田裡的守望者》等一批黃皮書（頁89）。由此能夠看出施咸榮作為體制內編輯兼譯者在文本選擇上的主觀能動性，可以說他就是《麥田裡的守望者》第一次漢譯的直接發起人，其政治合法性牢牢地根植於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領導人周揚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的文化工作會議。

為求遏制在史達林逝世後抬頭、在蘇共二十大後勃興的解凍思潮，¹⁴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於1957年5月在蘇聯文壇掀起了一場反修鬥爭，並透過將這場鬥爭置放在全球冷戰的格局下催發了大陸文壇的反右運動，¹⁵而在反修鬥爭宣告結束之際，蘇聯文壇卻迅速邁入了學習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借鑑西方當代文藝作品的嶄新時期。蘇聯文藝界的這一新動態引起了大陸的警惕，新僑會議就是對它的回應。這場探討批判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會議結束後，周揚立刻找陳冰夷、姜椿芳等專家座談，要求出版反面教材用以配合即將爆發的兩黨論戰，防止高級幹部與文藝領導像周揚在會上所說的那樣——對蘇聯「一知半解」，對歐美「一片漆黑」（張福生，2006）。此後的1960年，考慮到大陸文壇對西方所知極少，作家協會召開了兩三次外國文學情況交流會，與會的羅大岡、楊憲益、曹靖華等專家同《世界文學》編輯部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代表探討了西方文學的最新潮流，其中就涉及到一些反映歐美國家內青年群體對社會不滿的文學書寫，決定要選譯幾部並交

¹⁴ 「解凍思潮」指涉1950年代中期以愛倫堡（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的《解凍》（Оттепель）為發端的蘇聯新興文藝潮流，它要求一種「人性本位」以及「批判現實」的創作立場。

¹⁵ 1957年5月，赫魯曉夫面向蘇聯文壇作了題名為《文學藝術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繫》的講話，嚴厲批判了杜金采夫（Vladimir Dmitrievich Dudintsev）的《不是單靠麵包》（Not by Bread Alone）等解凍文藝，並且將國內的反蘇傾向提升到國際上反社會主義陣營的高度。根據方長安（2009）考證，這篇講話對一個月後大陸文壇的反右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頁103）。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其副牌之一即作家出版社——作為黃皮書發行（孫繩武，2006）。

由此可以推斷，政府贊助人出於學習批判以配合中蘇論戰之需，祕密開啟了翻譯出版異端文學的合法通道，卻在很大程度上把具體文本的選擇權下放給了專業人士——也包括出版社內部的編輯和譯者，這些專業人士轉而訴諸體制力量合法地譯介了自己按某種標準選定的異端文學，但他們的標準未必就隸屬於官方意識形態，很可能代表著另一種文學品味或學術觀點。根據施亮（2010）回憶：

1962 年底，父親動手翻譯《麥田裡的守望者》。次年 9 月，此書亦作為「內部參考書」出版。他較偏愛此書，認為塞林格無論塑造人物性格、描寫手法及語言文字，均具有精湛的文學修養。所以，他譯書時字斟句酌，十分下功夫。（頁 61）

另外，施咸榮曾向李景端坦白，他選譯《麥田裡的守望者》時認為：

對美國的認識，不能老停留在「紙老虎」這種印象上，有必要讓領導和更多的人了解更加真實的美國。而《麥田裡的守望者》，正是當時美國社會思潮的一種反映。（李景端，2006，頁 14）

因此，我們儘管承認翻譯出版行業在社會主義改造中逐漸被體制化，卻又不能斷定底層的作家出版社絕對地受制於上層由政府贊助人。其實，考慮到政府贊助人主動下放了選擇權，再加上文本選擇的私人性和隱蔽性，施咸榮等編輯與譯者也具有了容易被雙層贊助結構忽略的表述空間，而「雙層贊助」這一概念所產生的偏誤或許要追溯到勒菲弗爾那裡。

Lefevere（1992）雖然敏銳地觀察到贊助人透過操控專業人士從而規訓文學系統並使之服務於某種意識形態，但卻把專業人士置放在文學系統的內部，將其同外圍的贊助人系統截然分開，似乎相互作用的兩大系統之間彼此獨立且缺乏交集（pp. 14-16）。然而，諸如施咸榮這類扮演了編輯、譯者、學者等多重角色的專業人士明顯身處在兩個系統的中間地帶，他們不僅是以文學為本位並出於某種非政治性考量來挑選作品，還利用贊助機構的體制授權使

譯介選擇合法化。王友貴因為沒有去關注置身系統交界的那些具體個人，所以在一個高度精簡的雙層贊助結構裡，只見代表著意識形態的上層贊助對底層贊助的絕對控制，而不見後者內部的專業人士有可能在政治與詩學的夾縫中隱蔽地張揚了自身的主體性。其實，赫曼斯（Theo Hermans）早在將社會系統理論引入到描寫翻譯研究時，就強調要關注翻譯系統的「外部參照」，即系統與系統間水乳交融的那些面向（Hermans, 2009, p. 145）。此外，皮姆（Anthony Pym）也曾藉文化翻譯範式批判了系統間邊界的合理性，呼籲對「中間地帶」或「第三空間」的重視（Pym, 2014, pp. 375-377）。儘管勒氏及其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文論前輩反覆談到不同系統間的相互影響，但他們也同時在強調（文學）系統的自我指涉與內在角度。¹⁶ 這便提醒我們不妨跨越系統分野而關注系統間可能存有的交界地帶。

參、詩學的錯位：象徵話語中的異端文本

如前所述，大陸文壇自 1960 年開始留意歐美國家內青年群體的不滿情緒及與之相關的文學書寫，美國「垮掉派」文學便引來了戈哈（1960）、余彪（1961）、黎之（1963）等論者的批判，他們的文章在《世界文學》、《新華月報》、《文藝報》等權威刊物上公開發表，傳達著官方的意識形態立場和文藝審美規範。就在這場全面批判「垮掉的一代」的文學運動中，《麥田裡的守望者》以「垮掉先聲」的作品形象現身於董衡巽（1964）撰寫的〈文學藝術的墮落——評美國「垮掉的一代」〉一文。考慮到 1990 年代後的大陸學者更多把這部作品闡釋為心理小說或成長小說（張桂霞，2004，頁 158—159），且當今的「垮掉派」研究著述也鮮有談到塞林格及其代表作，

¹⁶ 勒菲弗爾的系統理論牢牢地根植於特尼亞諾夫（Yury Tynjanov）、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řovský）、洛特曼（Yury Lotman）、伊萬·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等形式主義及結構主義者提出的文論。他們普遍強調系統的獨立自主和邊界劃分。赫曼斯總結了學者的論點，譬如，特尼亞諾夫認為「就算文學系統並非完全獨立，它也肯定被賦予了某種程度的自主特性，無需與另外的系統共時演進」，而洛特曼亦呼籲要「從系統內視角去觀察該系統的內外分界」（Hermans, 2009, p. 105）。

這便同董文形成了對照，「垮掉先聲」解讀背後的建構性和話語性亦昭然若揭。¹⁷縱觀全文，董衡巽（1964）遵循著馬列主義與階級鬥爭的理論尺度，訴諸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相互參照的現代概念，從而將世界組織進一種按「我們／他們」劃分的二元結構。在這個基礎上，董衡巽（1964）展開對《麥田裡的守望者》內資本主義母題的批判，由此張揚了自己和國家反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又因為該小說被貶斥為「擅於偽裝的淫亂之作」，主角霍爾頓被定性為「思想墮落的少年罪犯」，而小說所展現的美國亦被指責為「帝國主義的警察國家」（頁221—227），文學批評中的政治話語便同時取得了倫理道德與民族意識的合法支持。官方表述中的《麥田裡的守望者》就這樣淪落成政治的異端——它自然也就是詩學的異端。

事實上，即便在私人的閱讀與闡述中，《麥田裡的守望者》也很有可能被理解成為一個異端文本。¹⁸儘管難以全面考察彼時大陸對這部禁書的私人閱讀，我們卻還是從施亮（2010）的回憶中尋得了線索：

記得，那時有一位從部隊轉業的幹部，也愛好業餘創作，常向父親借書看。他借去《麥田裡的守望者》，認真地讀一遍，卻對父親困惑地說：「我讀不大懂。原來看『麥田』兩字，還以為是寫美國農民題材呢！寫的卻是一個少年胡思亂想，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兒！」父親只是淡淡一笑，也未向他解釋什麼。（頁62）

《麥田裡的守望者》被簡化概括成「一個少年的胡思亂想」並不令人意外，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革命閱讀體系薰陶下，有機會接觸到這部小說的少數讀者大都希望看見土地改革中的貧農鬥地主、改造舊農民的農業合作化、準

¹⁷ 有關於董衡巽強行在這部小說與「垮掉」文學間確立的聯繫，Zhang（2021）開展過細緻的分析（pp. 20-24），因此不再贅述。

¹⁸ 這裡所謂的「私人閱讀」僅作一般概念，而非是要特指在學界廣受關注的地下文藝沙龍等非法閱讀形式。但據張國慶（2006，頁160—162）和沈展雲（2007，頁18—20）考證，無論是1960年代初由北京高幹子弟組成的「X詩社」與「太陽縱隊」，抑或是「文革」中周旋在趙一凡沙龍和徐浩淵沙龍之間的「白洋淀詩群」，其成員大都對《麥田裡的守望者》持欣賞、肯定的態度。考慮到這些社員反權威的政治立場與文化身分，他們對小說的認同進一步確證了其異端性和顛覆性。

共產主義的農村新生活這類農民敘事，¹⁹ 包括與之匹配的典型人物塑造、革命浪漫主義等文學表現手法，他們對《麥田裡的守望者》內容、形式與功能的期待通常會顯露出一種政治化乃至政策化傾向。²⁰ 但小說中，霍爾頓只為逃離那個物欲橫流又虛偽保守的成人世界，才構想出這片地處懸崖卻笑語歡聲的兒童麥田，可見他對麥田的想像實則是個體同自我、他人和社會相疏離的精神危機，張揚著反中產階級價值與工業資本主義的文化立場，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來說，《麥田裡的守望者》中此類反體制的母題及霍爾頓非理性的獨白自然是顯得莫名其妙而又令人不安，無論這位出身中產階級的反英雄主角怎樣抨擊社會主義的歷史大敵。至此我們看到，一部與體制抗衡的小說如若遭遇一個同政治合謀的詩學，其下場多是被當作異端。²¹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詩學與政治的合謀根本不是什麼祕密，它早期的徵兆可追溯到 1949 年第一次文代會上「文藝服務政治」這項總體方針的確立，²² 甚或七年前（1942 年）毛澤東（1991）有關「無產階級文藝隸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提法。²³ 不過歸根結底，此類政治化乃至政策化傾向源自於蘇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界說，如蘇聯作家協會（1934／1953）：

¹⁹ 當時大陸比較經典的農村敘事作品包括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周立波的《暴风驟雨》、《山那面人家》及柳青的《創業史》等。

²⁰ 此處的「期待」類似於諾德（Christiane Nord）在研究翻譯時區分開來的「構成規範」和「制約規範」（Nord, 1991, p. 100），換用到當前的語境下，前者指社群中有關「什麼算文學」的判定標準，後者指社群中有關「寫得好不好」的判定標準。可見「期待」絕非「推測」——即便當時的讀者能夠事先從封面裝幀、內部發行等線索推測出小說的異端性與顛覆性，但文本中裹挾的另類詩學仍很有可能會衝擊他們對優秀文學甚或文學本身的期待，儘管不無例外（見註釋 18）。

²¹ 必須指出，《麥田裡的守望者》抗衡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同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服務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甚至兩者在冷戰語境下截然對立。儘管如此，對於一向習慣高唱讚歌、塑造楷模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言，小說對體制的鞭撻仍顯得很陌生，以至被人簡化概括成「一個少年胡思亂想」（施亮，2010，頁 62）。

²² 「第一次文代會」全稱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於 1949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9 日間召開。

²³ 毛澤東（1991）曾指出：「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頁 865）。1949 年，周揚（1995）在題名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中要求作家「將政策作為他觀察與描寫生活的立場、方法和觀點」（頁 30），一年後邵荃麟（1950）又再次強調了掌握政策對文藝創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但直到 1953 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才在第二次文代會上被正式地確立為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不過這一主流詩學基本上貫穿了「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等不同時期裡社會主義的文學書寫，無論其名稱與內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被叫作「兩結合」抑或是「三突出」。

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藝術描寫的真实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頁 13）

可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本質如蔡翔（2010）所概括的那樣是某種「『觀念＋真實』的主觀產物」（頁 192），而「觀念」則明確地蘊含了政治性因素。當蘇聯定義中反覆強調的「藝術真實」及理論占據的政策地位伴隨著概念本身同時被引入大陸並就此紮根，²⁴ 這樣一個與意識形態水乳交融的主流詩學自然會和《麥田裡的守望者》發生錯位。坦白地講，我們希望避免對「翻譯文學是否屬於民族文學」的問題蓋棺定論，因為它不單涉及到翻譯文學的研究思路，而且更涉及到翻譯倫理與版權爭奪。但或許可以換個提問的方式，譬如，該怎樣去理解《麥田裡的守望者》走入 1960 年代大陸詩學體系背後的邏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僅僅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處理成對立於《麥田裡的守望者》的某種本質化概念，而要把小說放置在此一本土詩學的動態演進過程當中來觀察和理解。顯然，其間的邏輯既是詩學的，也是政治的。

李楊（1993）曾考察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三種經典話語組成的「話語系列」及其發生機制，這條作者概括為「敘事－抒情－象徵」的話語推展邏輯將會是我們論析的起點。在當代文學的創作實踐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最初是以集體敘事的話語形態登場的：1950 年代前後，長篇小說等敘事體裁占據了文學系統的中心，一批像《青春之歌》這樣的敘事文本反覆訴說著中國作為民族共同體和階級共同體在黨政領導與他者參照下締結而成的革命故事，但由於敘事話語洩漏了「民族／階級」的組織過程和營建屬性，如此獲取的國家本質並不够牢固——按李楊的說法，敘事的中國僅具有「形式的意義」，更多地是某種缺乏堅實內容的政治經濟制度（頁 284）。不過，也只

²⁴ 不過，史達林逝世一年後日趨興盛的解凍思潮促成了蘇聯官方對原初定義的修正，這個新動態也讓大陸文壇開始重新審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56 年，秦兆陽等一批理論家在「雙百」運動的民主浪潮中質疑並挑戰了定義對「客觀真實」的忽略及其對「政治真實」的迷信，但隨著 1957 年反右運動不斷擴大，此類觀點迅速地遭到了猛烈批判。

有從敘事話語中構築起民族國家這一共同主體，其間的個人才可能在歷史內確定他自身的位置並開始對現代的創造，而創造就意味著抒情。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開展，一種對「人民性」的信任——亦即相信群眾能夠自覺主動、不受剝削且充滿尊嚴地投身於勞動和生產——逐步為政黨政治所確立，這時「國家／人民」內部取消了他者的存在，無論工農階層還是知識分子都被其主體意識凝聚進「我們」當中。因此，自從 1950 年代中期以來，浪漫主義抒情話語充盈著大陸的社會主義文化想像：杜鵬程、周立波、王汶石等作家的短篇小說直接把歌頌對象瞄準為工人與生俱來或農民後天爭取的無產階級本質，而這種對抽象本質的抒情也同樣出現在楊朔、秦牧、劉白羽等散文家及賀敬之、郭小川等詩人的筆下，儘管郭小川前期詩歌《望星空》因誠實地記錄了敘事到抒情的話語交替進程而招致嚴厲批駁。²⁵ 總之，一切都表明抒情時期「人民性」的客觀化和自然化——「我們」與「我們」的本質，被銘刻入歷史最深處，並由此成為了不證自明的超驗存在，「我們」中每個人也都是共同本質的天然化身，誠如李楊（1993）所言，「當作家歌頌『個人』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歌頌本質」（頁 211）。

在抒情時期裡空前繁榮的不只有本土文學創作，還包括外國文學譯介。自 1950 年代中至 1960 年代初，大陸文壇意外秉持著相對公正的審美立場先後引介了少數所謂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作家作品，如積極干預生活的蘇聯解凍文藝、法國象徵主義的鼻祖波特萊爾、「迷惘的一代」的大部分成員等，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抒情中集結的「我們」短暫地壓抑或內化了敘事要鬥爭的他者。然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卻不願止步於抒情，隨著人們發覺曾歌頌的「人民性」未能完全實現，甚至還遭受到工業國家形態的威脅與消解，便出現了一種推展思想意識而非經濟生產的焦躁和渴望——也即是要搗毀故步自封的官僚結構，揚棄方才確立的共同本質，並代之以更純粹、更抽象的「無產階級意識」（李楊，1993，頁 273）。結果，到了 1960 年代，「人民性」

²⁵ 有關於郭小川抒情詩歌的成熟過程，李楊（1993）開展過細緻的分析（頁 237—251），因此不再贅述。

逐步為新本質所頂替，共同的「我們」又一次分裂出他者，而《麥田裡的守望者》就在抒情話語式微之際登上了象徵話語的歷史舞台。

據李楊（1993）的觀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 1960 年代中國演化為一種「現代集體象徵」，它絕不類同於法國象徵主義裡能指和所指隨性拼湊的個人象徵，恰恰相反，其具體形象與超驗理念之間的關係是文化社群約定俗成的，並帶有二元對立的現代性底層邏輯（頁 255—259）。因此，在「革命現代京劇」等象徵時期的經典作品中，所有人事物都被納入進我們姑且概括為「無產階級」與「剝削階級」的二元對立框架，每個形象天生就代表了某類本質，並主動地同對立的本質展開激烈抗爭——象徵話語要求一種極度客觀、極度自然的抽象本質和抗爭意識，它們被當作先驗的存在而演繹到具體的形象上，任何洩漏了本質建構性的敘說都無法為象徵所接受。透過象徵話語，我們終於看到《麥田裡的守望者》在本土詩學推展過程內的位置及功能。當周揚（1958）公開譴責歐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陣營給東方人民送來「大批充滿頹廢、色情和野蠻主義的黃色文化」（六版），作為符碼的「黃色」背後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這些與「我們」對立的本質，在某種程度上，《麥田裡的守望者》等黃皮書自然也就承襲了黃色的象徵意義，而此前論及的〈文藝八條〉和批判文章則進一步地演繹出了該小說所指涉的超驗理念，有時它被籠統地概括為「反動／垮掉」的思想情緒，有時又被具體地表述成「資產階級」、「修正主義」。但重要的不在於某個確切的本質命名，更在於象徵話語的運作模式——必須先樹立並對抗《麥田裡的守望者》的「非無產階級意識」，才能夠真正地獲取作為嶄新本質的「無產階級意識」，繼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便可訴諸於這類本質來進行自我確證，結果，其中的意象、人物、情節、母題、手法、體裁等因素都將演化成李楊（1993）所說的「抽象理念的感性體現」（頁 258）。倘若理念與理念及表象與理念之間的這種二元對立架構是象徵話語的底層邏輯，那麼「無產階級意識」和「資產階級意識」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對彼此的克服或超越，無論董衡巽（1964）如何猛烈地批判《麥田裡的守望者》中的「非無產階級意識」，

其後果只會是鞏固了二元對立架構，這最終也就是鞏固了象徵話語本身。

Lefevere (1992) 曾敏銳地指出：

系統內後來的主導詩學通常有別於系統最開始的主導詩學，其功能成分與形式成分可能都發生了很大改變，但每種詩學又千方百計地貶斥前身、否認交替，只為把自己置放在演化歷程中的絕對頂點。(p. 35)²⁶

正因如此，一個經鞏固強化的共同象徵必然會更急進地踐行對敘事和抒情的揚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從抒情到象徵的話語動態交替過程召喚出跨境的《麥田裡的守望者》及有關該翻譯小說的全部公開表述，這些又轉而透過對象徵的鞏固介入了本土詩學的話語流變，並由此助力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遵循著某種克服與超越的現代性邏輯不斷地推展。

肆、結語

透過鉤沉相關史料，本文以贊助結構、發行機制和詩學衝突為視點，宏觀地考察了《麥田裡的守望者》第一部漢譯本在 1960 年代大陸的產生與接受，並由此廓清其跨境歷程同意識形態及本土詩學間，或明或暗的纏繞關係。出於兩黨論戰時的學習批判之需，《麥田裡的守望者》在 1963 年被譯入新中國並淪為內部書，僅供符合資格的高官學者傳閱，而決定該項譯介選目的贊助人呈現出王友貴 (2015) 所謂的雙層結構 (頁 59)：底層的作家出版社附置於頂層政府贊助方，在意識形態、經濟資助和著譯人士的社會地位上，前者似乎始終遵從後者的指導、支配與控制。儘管這樣，政府贊助方卻將具體文本的選擇權利交予作家出版社，社內的編輯兼譯者施咸榮轉而訴諸體制授權，合法地挑中了《麥田裡的守望者》作為譯介對象，但其擇取標準未必就呼應著反資批修的政治號召，很可能是源自對小說藝術價值的欣賞及恢復美國真容的企望。如此看來，翻譯出版行業在社會主義改造中逐步形成的「雙

²⁶ 筆者自譯。

層贊助」遠非鐵板一塊，²⁷ 考慮到譯介選目權利下放給出版社，又加上擇取標準的私人性和隱蔽性，作家出版社這個底層贊助方便有了脫離政治規訓的特定操縱空間，而它正是「雙層贊助」及其理論根源容易忽略的縫隙或盲點。在位處贊助系統和文學系統交界的專業人士身上，我們得以管窺歷史同理論劃出的裂痕。

除卻小說的贊助出版，它與 1960 年代本土詩學之間的纏繞也構成其跨境命運的重要面向。無論在公開批判抑或是私人閱讀的領域，《麥田裡的守望者》似乎都被看作一個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水火不容的顛覆文本，但這種表面的詩學錯位確有其自治的底層邏輯。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話語動態交替進程中，小說的翻譯就誕生於李楊（1993）指認的象徵階段（頁 255—259）。作為對締結現代民族國家的敘事話語和張揚群眾主體意識的抒情話語之超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象徵話語透過抗衡《麥田裡的守望者》中的「非無產階級意識」，從而樹立「無產階級意識」並借助於這個嶄新本質來實現自我確證。既然象徵話語底層的運行邏輯為二元對立，那麼不論《麥田裡的守望者》的「非無產階級意識」被如何批判，它同「無產階級意識」之間都難以真正地消滅彼此，其後果反倒是鞏固了二元對立結構，這最終也就是鞏固了象徵話語本身。一個經鞏固強化的共同象徵轉而會更急進地踐行對敘事與抒情的揚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由此能遵循著克服或超越的現代性邏輯不斷地推展。綜上所述，透過剖析小說在 1960 年代大陸的贊助出版機制和詩學衝突邏輯，這項課題不僅為內部發行的文化現象鉤沉起曾被忽略的個案細節，更是給翻譯文學的歷史書寫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論啟迪。我們希望，此前對贊助系統與文學系統間專業人士的反思，以及在動態流變的詩學脈絡下考察譯本的嘗試，最終能助力於勒菲弗爾系統理論乃至當代翻譯文學研究的開拓和進展。

²⁷ 當然，該說法僅針對《麥田裡的守望者》的贊助與發行，我們無意將範圍擴大到全體內部書。更何況這種所謂的「文化偷渡」原本就不太可能構成一種常規現象，正如本文第二部分在標題中暗示的那樣，體制化贊助人留給專業人士的只能是「縫隙」。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中共中央（1997）。〈文化部黨組和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黨組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載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頁363—381）。中共中央文獻。

【CPC Central Committee. (1997). *Wenhubu dangzu he wenxue yishujie lianhehui dangzu guanyu dangqian wenxue yishu gongzuo ruogan wenti de yijian (caoan)*. In Party Documents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d.), *Jianguo yilai zhongyao wenxian xuanbian* (Vol. 15, pp. 363-381).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中共中央（2009）。〈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情況和改進出版工作問題的報告〉。載於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62—1963）》（第十二卷，頁276）。中國書籍。

【CPC Central Committee. (2009). *Zhongyang pizhuan zhongyangxuanchuanbu guanyu chuban gongzuo zuotanhui qingkuang he gaijin chuban gongzuo wenti de baogao*. In *Zhongguo Chuban Kexue Yanjiusuo & Zhongyang Dangangan* (Eds.), *Zhonghuarenmingongheguo chuban shiliao (1962-1963)* (Vol. 12, p. 276). China Book.】

戈哈（1960）。〈垂死的階級，腐朽的文學——美國的「垮掉的一代」〉。《世界文學》，2，147—157。

【Ge, H. (1960). *Chuisi de jieji, fuxiu de wenxue: Meiguo de “Kuadiao de yidai.” Shijie Wenxue*, 2, 147-157.】

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辦公室（主編）（1982）。《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58—1961）：內部文件》。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Ed.). (1982). *Chuban gongzuo wenjian xuanbian (1958-1961): Neibu wenjian*.】

- 方長安(2009)。《冷戰·民族·文學：新中國「十七年」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
- 【Fang, C. A. (2009). *Lengzhan, minzu, wenxue: Xin Zhongguo "shiqinian" Zhongwai wenxue guanxi yanjiu*. China Social Sciences.】
- 毛澤東(1991)。〈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出版社(編)，《毛澤東選集》(第3卷，頁847—879)。人民。
- 【Mao, Z. D. (1991). *Zai Yan'an wenyi zuotanhui shang de jianghua*. 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Ed.), *Maozedong xuanji* (Vol. 3, pp. 847-879). People's.】
- 王友貴(2015)。《20世紀下半葉中國翻譯文學史：1949—1977》。人民。
- 【Wang, Y. G. (2015). *A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s in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49-1977*. People's.】
- 余彪(1961)。〈美國的「垮掉的一代」〉。《新華月報》，8，96—99。
- 【Yu, B. (1961). *Meiguo de "Kuadiao de yidai."* *Xinhua yuebao*, 8, 96-99.】
- 李景端(2006)。〈眼光敏銳的施咸榮〉。載於李景端，《如沐清風——與名家面對面》(頁12—14)。百花文藝。
- 【Li, J. D. (2006). *Yanguang minrui de Shixianrong*. In J. D. Li, *Rumuqingfeng: Yu mingjia mianduimian* (pp. 12-14).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 李楊(1993)。《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時代文藝。
- 【Li, Y. (1993). *Kangzheng suming zhi lu: "Shehuizhuyi xianshi zhuyi" (1942-1976) yanjiu*. Shidai Literature and Art.】
- 沈志遠(1950)。〈發刊詞〉。《翻譯通報》，1，2—3。
- 【Shen, Z. Y. (1950). *Fakan ci. Fanyi Tongbao*, 1, 2-3.】
- 沈展雲(2007)。《灰皮書，黃皮書》。花城。
- 【Shen, Z. Y. (2007). *Huipishu, huangpishu*. Flower City.】
- 周揚(1958年10月13日)。〈肅清殖民主義對文化的毒害影響，發展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亞非作家會議上的報告〉。人民日報，六版。

- 【Zhou, Y. (1958, October 13). Suqing zhiminzhuyi dui wenhua de duhai yingxiang, fazhan dongxifang wenhua de jiaoliu: Zai YaFei zuojia huiyi shang de baogao. *People's Daily*, 6.】
- 周揚（1995）。〈新的人民的文藝（節選）〉。載於謝冕、洪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1948—1975）》（頁19—34）。北京大學。
- 【Zhou, Y. (1995). Xin de renmin de wenyi (jiexuan). In M. Xie & Z. C. Hong (Eds.),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shiliao xuan (1948-1975)* (pp. 19-34). Peking University.】
- 邵荃麟（1950）。〈論文藝創作與政策和任務相結合〉。《文藝報》，3（1），10—12。
- 【Shao, Q. L. (1950). Lun wenyi chuangzuo yu zhengce he renwu xiangjiehe. *Wenyi Bao*, 3(1), 10-12.】
- 施亮（2006）。〈關於黃皮書〉。《博覽群書》，4，89—90。
- 【Shi, L. (2006). Guanyu huangpishu. *Chinese Book Review Monthly*, 4, 89-90.】
- 施亮（2010）。〈一本暢銷書的翻譯歷程〉。《海內與海外》，4，61—62。
- 【Shi, L. (2010). Yiben changxiaoshu de fanyi licheng. *At Home and Overseas*, 4, 61-62.】
- 孫繩武（2006年9月6日）。〈關於「內部書」：雜憶與隨感〉。《中華讀書報》。
- 【Sun, S. W. (2006, September 6). Guanyu “neibu shu:” Zayi yu suigan. *China Reading Weekly*.】
- 張欣（2020）。〈政治化的言說與先鋒性的重塑：「十七年」《麥田裡的守望者》譯介的形象學闡述〉。《東方翻譯》，1，15—23。
- 【Zhang, X. (2020).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a reshaped avant-garde work: An imag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1963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1, 15-23.】
- 張桂霞（2004）。〈《麥田裡的守望者》研究在中國〉。《鄭州大學學報》，

5, 158 – 161。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204.2004.05.047

【Zhang, G. X. (2004). The study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n China.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5, 158-16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204.2004.05.047】

張國慶（2006）。《「垮掉的一代」與中國當代文學》。武漢大學。

【Zhang, G. Q. (2006).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張福生（2006年8月23日）。〈中蘇文學交流史上一段特殊歲月——我了解的「黃皮書」出版始末〉。《中華讀書報》，版98。

【Zhang, F. S. (2006, August 23). Zhong Su wenxue jiaoliushi shang yiduan teshu sui Yue: Wo liaojie de “huangpishu” chuban shimo. *China Reading Weekly*. C98】

曹禹（1958年4月26日）。〈斥叛徒法斯特〉。《文藝報》，8，31 – 34。

【Cao, Y. (1958, April 26). Chi pantu Fasite. *Wenyi Bao*, 8, 31-34.】

馮至（1966）。〈外國文學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前進〉。《世界文學》，1，182 – 195。

【Feng, Z. (1966). Waiguo wenxue gongzuozhe zai Maozedong sixiang de qizhi xia qianjin. *Shijie Wenxue*, 1, 182-195.】

塞林格（Salinger, J. D.）（1963）。《麥田裡的守望者》（施咸榮譯）。作家。（原著出版年：1951）

【Salinger, J. D. (1963). *The catcher in the rye* (X. R. Shi, Trans.). Writer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1)】

楊露（2015）。《革命路上：翻譯現代性、閱讀運動與主體性重建，1949 – 1977》。中央編譯。

【Yang, L. (2015). *On revolutionary road: Translated modernity, underground reading move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1949-1979*.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主編）（1993）。《當代中國的出版事業（中）》。

當代中國。

【Dangdai Zhongguo Congshu Bianjibu. (Ed.). (1993). *Dangdai Zhongguo de chuban shiye (zhong)*. Contemporary China.】

董衡巽（1964）。〈文學藝術的墮落——評美國「垮掉的一代」〉。載於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主編），《文學研究集刊》（第1冊，頁212—227）。人民文學。

【Dong, H. X. (1964). *Wenxue yishu de duoluo: Ping Meiguo "Kuadiao de yidai."* In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Ed.), *Wenxue yanjiu jikan* (Vol. 1, pp. 212-227). People's Literature.】

蔡翔（2010）。《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像（1949—1966）》。北京大學。

【Cai, X. (2010). *Geming/xushu: Zhongguo shehuizhuyi wenxue: Wenhua xiangxiang (1949-1966)*. Peking University.】

蔣華傑、劉陽（2013）。〈冷戰背景下新中國內部發行制度的演變與影響〉。《中共黨史研究》，5，35—44。

【Jiang, H. J., & Liu, Y. (2013).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PRC's internal circulation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CPC History Studies*, 5, 35-44.】

黎之（1963）。〈垮掉的一代，何止美國有〉！《文藝報》，9，24—29。

【Li, Z. (1963). *Kuadiao de yidai, hezhi Meiguo you!* *Wenyi Bao*, 9, 24-29.】

蘇福忠（2000）。〈老黃今年八十歲〉。《人物雜誌》，1，100—107。

【Su, F. Z. (2000). *Laohuang jinnia bashisui*. *Portrait*, 1, 100-107.】

蘇聯作家協會（1953）。〈蘇聯作家協會章程〉。載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蘇聯文學藝術問題》（曹葆華等譯；頁12—19）。人民文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34）

【Writers' Union of the U.S.S.R. (1953). *Sulian zuojia xiehui zhangcheng*. I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Ed.), *Sulian wenxue yishu wenti* (B. H. Cao et al., Trans.; pp. 12-19). People's Literatur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英文文獻

- Blackstock, A. (1992). J. D. Salinger. In F. Magill (Ed.), *Magill's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pp. 1798-1809). Salem.
- Hermans, T. (2009).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St. Jerome.
-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 Nord, C. (1991).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Rodopi.
- Pym, A. (2014).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2nd e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857633>
- Salinger, J. D. (1951). *The catcher in the rye*. Little, Brown.
- Whitefield, S. (1997). Cherished and cursed: 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New England Quarterly*, 70(4), 567-600. <https://doi.org/10.2307/366646>
- Zhang, X. (2021).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competing narratives: Renarrating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n China (1949-1966)*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